

“左联”十年论争与俄苏文学文论传播中的期刊

陈国恩（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孙霞（武汉大学文学院）

目 录

- 一、“革命文学”的论争
- 二、与新月派、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和“文艺大众化”的讨论
- 三、“两个口号”的论争
- 四、结语

俄苏文学和文论在中国的传播对于引导和规范中国现代文学的方向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左联”十年的文艺论争与俄苏文学文论的传播更是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关于“左联”十年的论争与俄苏文学和文论在中国传播接受的关系，学术界已做了相当系统深入的研究。不过，此类研究往往忽视了传播俄苏文学与文论的重要媒介——期刊在其中所起的重大作用。本文围绕“左联”十年中几次大的文艺论争，对中国期刊翻译介绍俄苏文学和文论的情况，包括俄苏文艺政策和文坛消息的介绍，做一系统考察，用实证的方法，借助数据的统计，探讨这一时期的期刊如何通过译介俄苏文学和文论从而有力地影响了这些文艺论争的，向人们展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新的维度。

一、“革命文学”的论争

- 1、1917年初至1928年初的期刊译介俄苏文学与文论的特点

外来文艺思想的传播和产生影响，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探讨“革命文学”论争与俄苏文学文论在中国传播的关系，之所以要划定1917年初到1928年初的时间界限，是因为1917年初，《新青年》、《小说月报》、《文学周报》等开始大量译介俄苏文学及文论，而伴随着创造社的突变和“太阳社”的成立而发生的“革命文学”论争则在1928年初走向了高潮。1930年春左联成立时，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已基本上烟消云散，1928至1930年期刊对俄苏文学文论的大量译介主要是为下一阶段的论争做准备，因而此处暂不予讨论。

1917年至1928年，中国期刊开始成规模地译介俄苏文学文论。这一时期刊物译介俄苏文学文论的特点，影响到了“革命文学”论争的发生和发展。由于此阶段持续的时间较长，期刊译介俄苏文艺的数量多，内容复杂，为论述的方便，特对期刊译介的俄苏文学文论进行归类，制作了表1。以下的分析就是以表1的数据为基础的。

重视名家名作的翻译，无产阶级作家作品译介不多。名家名作是指在文学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如托尔斯泰、契诃夫、库普林、安得列夫等作家及其作品。据表1，此阶段大部分期刊都注重作家作品的介绍，它在所译介的作品类型中远远超过其他三类。这时期作家作品的翻译为229篇，文论的译介有98篇，文坛消息38篇，时政要闻175篇。其中作家作品的翻译占这一阶段所翻译作品的一半多。我们还可发现，期刊偏重于译介名家名作，而较少关注名气一般的作家作品，表1中俄苏文学作品类“其他”一栏就是这类名气较小的作家作品。在所翻译的229篇作品中，名家的作品173篇，而“其他”只有53篇，前者是后者的3倍多。这显然是因为接受外国的文学一般首先是从名家名作的翻译开始的，就像我们要了解唐朝文学必要知道李白杜甫的诗歌，要掌握明清文学必得知道“四大名著”。俄罗斯的一些著名作家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在这个时期极受期刊编辑的青睐。托尔斯泰的《我们要怎么办呢？》、《复活》等代表作及系列中短篇小说在这时期得到了大量的译介。为了有助于读者对这位大师的了解，在其小说获得大量翻译的同时，期刊还注重对他的思想与生平的介绍，如《小说月报》专门开设了“托尔斯泰百年纪念”专栏。作为俄罗斯的著名作家，契诃夫的小说和戏剧在中国也极受欢迎，他的作品在1949年以前差不多全部译介到中国了，而他大部分作品却是在现代文学史的第一个十年翻译过来的，当时差不多每家期刊都刊载过契诃夫的作品，《小说世界》所译介的俄苏文学中基本上以契诃夫的作品为主。屠格涅夫是俄罗斯自然派的鼻祖，他作品的写实风格最受当时中国人的欢迎，如其他几位俄罗

斯文学大家一样，差不多每家期刊都有对他作品的翻译和介绍，如《猎人日记》、《罗亭》等名作都是这个时期传到中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也有大量译介，《文学周报》更是大力翻译这位文学大师的作品，在第19、20期为他设了作品专栏。同时，根据表1，我们发现，期刊对无产阶级文学和左派倾向的作品介绍很少，只有17篇，远远少于名家名作与“其他”类的作家作品。以高尔基为例，一些重要的期刊，如《新青年》、《文学周报》、《努力周报》等，不见他的作品翻译。有少数期刊虽也刊发了他的一些作品，但是相对于上述名家，其位置就显得稍逊一筹了，如《改造》译介了契诃夫与托尔斯泰的好些作品，可是高尔基的作品仅有《赞Lenin》一篇。到了第二个十年，各种类型的期刊不但大量译介高尔基的文学作品和文艺论著，同时文坛消息中有关高尔基的新闻也往往处于一个较重要的位置。这说明在第一个十年，期刊编辑还没有意识到作为无产阶级伟大作家高尔基的重要性。

苏联时政要闻的介绍占相当比重 据表1，我们发现这一阶段有关苏联的政治要闻及政论文的译介有175篇，在所有类型的译介中数量占先，只有作家作品类可与之相比，而且其所占比重也远远超过中国现代文学史后一个十年的时政要闻。这当然与苏联“十月”革命成功这一重大事情有关。“十月”革命的成功，震惊了全世界，当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民众感受到了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寻求富国强民道路的过程中，他们非常羡慕这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期刊为国人及时地了解这一巨大的变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其中尤以《新青年》所译介的时政要闻最多，所占的比重也最大。《新青年》翻译文学作品16篇，翻译文论7篇，文坛消息3篇，而时政要闻竟有107篇，其数量不但远远高出其他期刊，而且与它自身刊发的其他类翻译作品相比也占绝对优势。它的译介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不但介绍了苏维埃俄罗斯在国际上的地位与处境，也细述了它国内的教育、就业、经济政策、妇女问题，以及一些重要领导人的政治见解等，几乎每一卷都有介绍，并在第8卷设有三期“俄罗斯研究”专号。此外，因为当时大家非常关注“十月”革命的成功，因而这方面的译介文章占了相当的比重，如《新青年》发表的《俄罗斯革命之五年》、《俄罗斯革命和唯物史观》、《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等。这些看似与文学论争没有关系的背景知识事实上为提高民众的思想水平、为“革命文学”论争的发生起到了铺垫作用。

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译介数量偏少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前后，苏联文学界出现了空前活跃的景象，流派纷争，各种口号和主张层出不穷。同时，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这

场纷争中也得到了大力的传播。但是,根据表1我们可以发现,在这段时期传入中国的俄苏论文相对同期俄苏文学作品的翻译与国情介绍来说,只占很少的一部分,仅98篇,只高出文坛消息译介的数量。这些论文涉及到作家作品的评介及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等方面,不管是哪一方面,都介绍得不够充分。其中无产阶级文论的译介更是单薄,只有17篇,《小说月报》和《莽原》就占了13篇,其他19家期刊总共才译介了4篇,远远低于“其他”类的文论译介。这时期对列宁、普列汉罗夫、托洛茨基等苏联高层领导的文艺观点的介绍,相对于他们在无产阶级文论方面所作的贡献来说,显然偏少。这种忽视文论译介特别是无产阶级文论译介的情况,与“革命文学”论争的参与者不能全面了解、掌握无产阶级文艺观并把它们转化为论争中的有力武器有很大的关系。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一时期期刊的编辑指导方针不带明显的阶级倾向性,比较笼统。比如《每周评论》在《发刊词》中明白宣布其宗旨“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大字”,表现了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倾向;《少年中国》主张“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¹⁾;《解放与改造》声明:“我们当首先从事于解放:就是使现在的自我完全从以前的自我解放出来;同时使现在的世界也从以前的世界解放出来。”²⁾《小说月报》提倡“为人生的艺术”;《一般》的编辑方针为“对于各种主义,都用平行比较研究,给一般人作指导,救济思想界混沌的现状”³⁾。从这些期刊的编辑宗旨中,我们不难看出结论,此时期的期刊注重以文艺来创造新的人生,往往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较少无产阶级的意识。在这样的思想观念指导下,期刊不注重文论特别是无产阶级文论的译介也就在情理之中。此外,苏联虽然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政权,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遗产和列宁的文艺思想还来不及系统的整理和深入的发掘,这也影响了无产阶级文论在当时中国的传播。

2. 期刊译介俄苏文学与文论对论争的影响

“革命文学”论争正是在俄苏文学文论传播的这一背景中发生的,中国期刊对俄苏文学文论的译介影响到了这一场论争的发生与发展。

建构了论争的知识背景 一场参与人数众多的“革命文学”论争,是由多方面因素引发的。《新青年》等诸多期刊对苏俄政治、经济、文化的介绍则为这场论争提供了知识背

1) 陳荒煤:《中國現代文學期刊目録匯編》(上)第67頁,天津人民出版198年版

2) 陳荒煤:《中國現代文學期刊目録匯編》(上)第84頁,天津人民出版198年版

3) 陳荒煤:《中國現代文學期刊目録匯編》(上)第810頁,天津人民出版198年版

景，或者说为论争做了意识形态的准备。苏联社会的蓬勃发展使中国民众十分仰慕，在相当大的范围内逐渐形成了一切以苏联为是价值取向，并由敬仰苏联而热爱俄罗斯文化，尤其是俄罗斯民主主义文学及文艺思想成了中国进步文化人士所崇尚的对象。其影响所及，使“革命文学”论争者竞相引用俄苏评论家的观点，或以俄苏文学的例证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诚如鲁迅在《“醉眼”中的朦胧》里所讽刺的：“知道跟着人称托尔斯泰为‘最卑污的说教人’”⁴⁾。不仅是托尔斯泰，别的俄罗斯文学名家成了中国文化人士心目中的权威，如侍衍为了让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便引用了“一位最能表现时代的伟大底作家屠格涅夫的话，来教训教训这群无聊底人们”⁵⁾。冰禅在他的《革命文学问题》中以安得列夫、托尔斯泰等作家及其作品为例，认为“俄罗斯一些伟大的作家，个个是忠实于艺术者，同时也是个忠实于人生者”⁶⁾。这些人中，有的是因为通晓外语或者在国外留学而掌握了俄苏文学的知识，但并非所有参与论争的人都具有这种条件和经历，而且一般的民众更没有这样的便利。大多数人显然主要是通过期刊的译介才了解俄苏文学和文论的，由此形成了他们关于文学的价值观念。可见期刊在俄苏文学和文论的传播与接受中起到了一种桥梁作用。没有这一座桥梁，“革命文学”的论争可能就不容易发生，至少会是另一种局面。

促进了对理论问题的重视 “革命文学”论争的积极成果主要不在于澄清了当时论争者所争辩的“革命”与“文学”的关系问题，而是让大家明白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论争者理论修养的欠缺，从而感悟到了加以弥补的紧迫性，开始着手系统地翻译苏联的文艺论著，以满足自己和他人的需要。比如鲁迅，他在《〈三闲集〉序言》里写道：“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汉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⁷⁾

加强理论修养的一个目的，是为了加强新文艺的建设。但当主要的问题变为应该建设一种什么样的新文艺时，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开始通过期刊的译介传入了中国，为中国的文艺建设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资源，从而规约了人们对文艺问题的思考。

4) 李何林：《中國文藝論戰》第22頁陝西人民出版社198年版

5) 李何林：《中國文藝論戰》第36頁陝西人民出版社198年版

6) 李何林：《中國文藝論戰》第55頁陝西人民出版社198年版

7) 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第174頁，陝西人民出版社198年版

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的提出是与当时期刊对俄苏文论的译介分不开的。这个口号原是“拉普”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提出来的。作为20年代苏联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文学团体，“拉普”领导了无产阶级作家国际联络局工作，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正在积极向苏联无产阶级文艺看齐的中国左派文艺人士关注和接受这一创作方法是顺理成章的事，而期刊的翻译和介绍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早在1924年4月，沈雁冰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俄国的新写实主义及其他》一文，已经提到了文学创作方法问题。麦克昂（郭沫若）在《留声机器的回音》中也大力提倡“辩证法的唯物论”。而鲁迅于1928年中旬在《奔流》上所发表的《苏俄的文艺政策》对当时苏联文坛上的一些现象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苏联文论及文艺政策的译介为当时的中国人了解苏联文坛状况及发展趋势提供了重要的帮助。从沈雁冰提出创作方法问题到20年代末，中国文艺界经历了从五四式写实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的转变。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本身虽带有“左”的特点，在实际创作中容易诱发以世界观代替创作方法、让作家去表现观念形态的所谓生活本质，从而造成概念化的毛病，但在中国当时它却起了积极的作用，因为事实上是由它克服了当时的所谓革命浪漫谛克的流行。激情过后现理性，茅盾在《从牯岭到东京》中再次谈到了文艺创作方法问题，回顾了自己通过期刊的译介对“新写实主义”的了解过程，他论述了“新写实主义”出现的缘由及应用于中国社会的可行性。这种客观理性地分析外来的文学观念，与“革命文学”论争中的无谓争执比较起来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也可以说是“革命文学”论争后进步文艺界人士趋向成熟和理性的一个表现。

助长了论争中的简单盲从倾向 不过，“革命文学”论争中出现过一些严重的问题，这从源头上考察，其实也是与当时的期刊对俄苏文学和文论的译介状况相关的。由于这一时期刊物的编者对俄苏文学文论了解还不深入，译介不够全面，特别是无产阶级文论的译介太少，从而给“革命文学”论争带来了负面的影响。这一问题首先引起鲁迅的关注，他后来在1930年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写道：“藏原惟人是从俄文直接译过许多文艺理论和小说的，于我个人就极有裨益。我希望中国也有一两个这样的诚实的俄文翻译者，陆续译出好书来，不仅自骂一声‘混蛋’就算尽了革命文学家的责任。”⁸⁾由于翻

8) 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中國現當代文學教研室主編：《文學運動史料選》第74頁，上海教育出版1979年版

译的缺失导致理论修养的欠缺，像鲁迅所指出的，一些“革命文学家”有时不是以理服人，而是用“王婆骂街”来维护自己的观点。如克兴在《评驳甘人的〈拉杂一篇〉》中的论辩就近乎漫骂：“中国旧文坛底一些健将，趣味文学家，手淫文学家鲁迅先生甘人君一千人物于是起了极大的恐慌，未免惊醒了他的醉眼朦胧，搅乱了他抄《小说旧闻》底清兴。”⁹⁾有的论辩还有人身攻击之嫌，如成仿吾在《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一文中讽刺鲁迅为堂吉珂德：“我们中国的唐吉珂德，不仅害了神经错乱与夸大妄想症，而且同时还在‘醉眼陶然’”¹⁰⁾。这种不以事实为依据、而以强辩甚至攻击的态度来阐发自己观点的例子很多，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的一些成员是突出的代表。有时连鲁迅也会出于激愤而“不以理服人”，如他在与新月社的论战中就激愤地说：“倘以表现最普遍的人性的文学为至高，则表现最普遍的动物形——营养，呼吸，运动，生殖——的文学，或者除去‘运动’，表现生物性的文学，必当更在其上。”¹¹⁾理论修养不足的后果，还导致论争者经常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引经据典以支持自己的观点，像鲁迅在《上海文艺界一瞥》中所说的：“要人帮忙时用克鲁巴金的互助论，要和人争闹的时候就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¹²⁾如冰禅在《革命文学问题》中，同时引用了马克思、蒲列汉诺夫、列宁、托洛斯基、布哈林等人的观点，其实他所引的这些人的思想虽有某种联系，但在相当程度上是存在重大差异的，冰禅一古脑儿地引用，反而暴露的是幼稚。幼稚还表现在论争的过程中，双方都无力解决对方所提出的问题，这在李何林的著作《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中》有很精当的论述：

创造社在当时所发表的‘唯物的文艺论’，不过粗粗的解释了上层文化与下层经济基础的关系，和文艺与经济及社会环境的关系；至于上下层文化的相互关系或影响上层文化各部门见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文艺的错综复杂的反映客观世界，都没有较详的解释或分析。以至不但鲁迅的阶级性始终不定，即冰禅所提出的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几位世界著名作家及其作品的社会作用究竟如何，也未能解答……¹³⁾

9) 李何林：《中國文藝論戰》第145頁陝西人民出版社198年版

10) 李何林：《中國文藝論戰》第166頁陝西人民出版社198年版

11) 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中國現當代文學教研室主編：《文學運動史料選》第68頁，上海教育出版1977年版

12) 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中國現當代文學教研室主編：《文學運動史料選》(2) 第227頁，上海教育出版1977年版

值得注意的还有，这一阶段的期刊虽然译介了大量的苏联文学作品，却很少有对苏联文学现象、苏联文艺政策及苏联的作家作品进行评论的文章。通过对资料的整理，我们发现这方面的文章只有寥寥几篇，如《小说月报》14卷第6号的读后感《爱罗生珂君的〈“爱”字的疮〉》及14卷第11号的《〈灰色马〉与俄国社会运动》，还有《文学周报》第52期载有仲特的《谈〈工人绥惠略夫〉》等。这方面的不足对读者及论争参与者也有一种潜在的负面影响，使他们在接受苏联文艺时往往处于较被动的状态，缺乏独立判断的能力。反映到论争中，便是对苏联文艺政策的盲从，即如鲁迅所说的：“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的运用了。”¹⁴⁾

“十月”革命胜利前后乃至整个20年代，苏联国内的文艺运动和文艺思想斗争是非常活跃的，其中也存在着不少宗派主义的意气之争。期间虽有列宁对波格丹诺夫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批判，苏共中央也就文艺问题做出了决议，但实际情况是“左”的文艺思潮从来没有停止过。苏联的这种文艺斗争风气影响了全世界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中国的“革命文学”论争中的左倾与这种影响也有很大的关系。具体的表现，就是以苏联的主导文艺思潮作为自己理论依据，一味地盲从。如“创造社”一再提倡艺术“应该为提高无产阶级底生活水准，当作组织的，斗争的工具去使用”¹⁵⁾，是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波格丹诺夫的艺术是“组织社会经验”的观点的翻版。“创造社”提出“无产阶级文学的形式问题”，以规定“无产阶级文学的形式”，这种机械的形式论观点是“拉普”的前身“岗位派”的主张之一。麦克昂（郭沫若）在他的《英雄树》中提到“阶级文艺是途中文艺”^③，郁达夫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学》一文末尾断定“真正无产阶级的文学，必须由无产阶级者自己来创造，而这创造成功之日，必在无产阶级握有政权的时候”¹⁶⁾。表达的都是托洛茨基的观点，即托洛茨基所说的“无产阶级文化不仅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④的意思。此外，他们对鲁迅、矛盾的攻击与苏联“拉普”对待“同路人”的极端排斥的态度也如出一辙。“革命文学”论争过程中的简单盲从现象，当然是被动接受苏联文艺观点的结

13) 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第172頁，陝西人民出版社198年版

14) 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中國現當代文學教研室主編：《文學運動史料選》(2) 第227頁，上海教育出版社1977年版

15)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先代文學教研室編：《“革命文學”論爭資料選編》(上) 第7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年版

16) 李何林：《中國文藝論戰》第71頁陝西人民出版社198年版

果，然而与同一时期刊物被动地译介俄苏文学和文论又有很大的关系。由于期刊本身较为普遍地缺乏明确的理论指导，因而未能有意识地引导读者对苏联文艺现象进行深入的批判分析，所造成的影响就是一些论争的参与者对苏联文艺倾向的被动追随，而不是去独立地去做出判断。

二、与新月派、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和“文艺大众化”的讨论、

1928年初至1934年中，中国文坛先后发生了左翼与新月派、“左联”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和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这一阶段期刊译介俄苏文学和文论的情况也对这些论争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与上一个十年的情形相比，这种影响甚至更为直接。

1、1928年初至1934年中期的期刊译介俄苏文学与文论的特点

选定这个时间段，是因为这几次论争主要集中在这一时期，此后也就散为余响了。同时也因为1934年9月苏联召开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作家的创作统一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些影响到了中国期刊对俄苏文学与文论的译介，出现了与前一阶段明显不同的新面貌。“革命文学”论争前期，大多数期刊的阶级倾向性并不自觉。但是1928年以后，由于中国社会政治阵营的对立和斗争急剧地加强，许多期刊明显地表现出了不同的阶级倾向（这里把不表明自己阶级立场的期刊也看作是一种倾向）。此外，据资料可以发现，从1932年5月开始，对苏联无产阶级文论的译介相对减少。从表3可以看到1928年1月至1932年4月，无产阶级文论的译介数为70篇，译介的文章总数为588篇，两者的比数是0.119；据表4，1932年5月至1934年7月，无产阶级文论23篇，译介的文章总数为232篇，两者的比率降为0.0199（四舍五入，取小数点后4位）。考虑到更细致地分析这一阶段的期刊译介苏联文学与文论的特点，我们以1932年4月为分界点，对1928年—1934年7月的文论进行两段统计，由此探讨译介俄苏文学文论的编辑策略对这一时期文学论争的影响。

为便于说明问题，采用两种方式对这一时期的期刊进行统计分析：一种是按照期刊的倾向分类，另一种是按照期刊存在的时间段分类。按期刊倾向进行统计，制作了表2，按期刊存在的时间段统计，制作了1928年1月至1932年4月的表3和1932年5月至1934年7月的表4。同时，各表仍分“作家作品”、“文论”、“文坛动态”、“时政要闻”等栏，并继续划分

出“名家名作”与“左派倾向作家作品”，以便与上个阶段期刊译介的特点进行对比。“文论”一项也同样划分出了“无产阶级文论”、“中国读者评论”及俄苏非无产阶级文论的“其他”一类，因为“无产阶级文论”译介的状况直接影响了这一阶段的文学论争，而“中国读者评论”体现了中国读者逐渐走向成熟，对论争起到了积极推动的作用。要特别说明的是，纳入统计的并非这一阶段的全部期刊，一些译介俄苏文学与文论数量很少的期刊不在统计的范围内。由于它们译介的数量很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其缺位不会影响整个的统计分析。

按照期刊倾向分类（参见表2）

① 倾向左翼的刊物 这些期刊存在时间短。《未名》半月刊从1928年1月创刊到1930年4月终刊，为时两年多一点；《奔流》1928年6月创刊，1929年12月终刊，为时一年半；《大众文艺》1928年创刊，1930年6月终刊，为时一年多。另外几种期刊都一年不到，其中《引擎》仅出了一期。期刊存在时间短，当然与经费不足有关，但主要还是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杀。由于这些期刊大都是理论的热切呼唤者，因而存在时间虽短，却积极地译介无产阶级文论，共计26篇，为这一时期这类期刊整个所译介文论总数的44%，远远高出同人期刊的15.5%。如影响深远的鲁迅的《俄苏的文艺政策》是连载在《奔流》上的，卢那察尔斯基的几篇著名文论也刊载于《海风周报》。很显然，这为论争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提高创造了条件，但也预示了他们在后来的论争中追随苏联文艺政策的必然性。与此相对应的是，这类期刊对作家作品的译介与对文论的译介等量齐观，数量几乎一样多，前者为56篇，后者为59篇。重文论而忽视作品翻译原是激进主义者的特点，他们抱着热切的愿望，希望读者能迅速地接受他们的观点。倾向左翼的这些刊物能在重视文论译介的同时十分重视作家作品的翻译，说明其在新文艺建设的问题上已经相当成熟和理性。

② “左联”刊物 “左联”的期刊存在时间甚至更短，一般不到一年。作为具有组织性和战斗力的“左联”期刊，它们在译介俄苏文论的同时，也能注重俄苏文学作品的翻译，与译介的总数相比，其比率为0.3821，高出倾向左翼期刊0.032个点。不过根据表2，我们可以发现，“左联”期刊译介的基本上都是“十月”革命前后具有左派倾向的作家作品。这一时期其所译介的作品总数为47篇，而其中倾向左派的作品就有43篇。同时，“左联”期刊很注重俄苏文学作品的介绍和评论。就拿《文化月报》第1卷第1号来看，其所刊登的文艺坛消息9篇中有3篇是有关苏联文学的；所刊发的作品评论共17篇，其中有关俄苏文学的

就有9篇。此外，“中国读者评论”相对于第一个十年和其他类型的期刊，也更倾向于对苏联无产阶级作家作品的评论。这表明左翼文艺界已经充分意识到了无产阶级文学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也表现出译介单一化的缺陷。

③ 同人期刊 一般是由爱国人士创办，往往更关注读者的审美需求，因而能较全面地译介苏联文学作品并能比较及时地介绍苏联文坛的消息。据表2，我们可以看到，此类期刊关于苏联文坛的消息数量远远高于同期的其它两类期刊，这为中国读者全面及时地了解苏联文坛动态提供了积极的帮助。作为爱国而又能敏锐、理性地把握文坛动态的期刊，它们的译作既有“十月”革命前的一些名家名作，对“十月”革命后的无产阶级作家作品也不排斥，两者的数量大致相等。此外，它们在译介文学作品及文学评论的同时，常常发表中国读者对苏联文坛及作家作品的评价，表现出积极主动的编辑态度。如创办于1928年的《春潮》编者在《编辑室的话》中写道：“我们的态度原着重在我们民族的病根的发掘，苦闷的表现，忠实的灵魂的扩张，进步的生活的要求：总之是以发表真挚的思想文艺的著述为主旨。”¹⁷⁾与《春潮》的编辑方针相类似的还有《文艺新闻》，这个期刊不仅仅刊载文艺新闻，还兼有对文艺、时事、社会思潮的评述。在一般的文化报道与评述之外，此刊还设有的一些专栏，其中“代表言论”一栏集中体现了它的爱国主义的政治思想倾向，即如它在创刊号上所声明的办刊宗旨一样，是“致力于文化之报告与批判”¹⁸⁾。可以看出，这种编辑方针对它们“兼容并包”的译介有很大的影响。

按照期刊存在的时间段分类

① 1928年1月—1932年4月 以1932年为界，是因为苏联文坛上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即“拉普”的解散。这一事件影响到中国，“左联”停止对“第三种人”和“自由人”的批判就与此有关，这以后中国期刊对俄苏文学与文论的译介出现了新的特点。

从表3可以发现，相对前一阶段的译介来说，这一时期的刊物对名家作品的翻译为100篇，与此时译介的俄苏作家作品总数221篇之比为0.4525，而上个阶段这两者的比率为0.7554。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左派倾向的作品译介数从前一个阶段的寥寥几篇（与所译介的作品总数之比为0.0742）一跃为108篇，与作品总译介数的比率猛升到0.491。这表明这一时期俄苏文学名家名作的译介相对减少，而左派倾向的作家作品的译介迅猛增长。

17) 陈荒煤《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上）第96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年版

18) 袁殊：《文艺新闻最初之出发》，《文艺新闻》1933年3月第号。

这一时期，不但倾向左翼的期刊和“左联”的期刊译介了大量苏联无产阶级著名作家作品，同人期刊也在翻译名家作品的同时，介绍了一些苏联无产阶级的作家作品。这种情形显然与苏联“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的国际地位提高有关，也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影响急剧扩大密切相关。这一阶段译介俄苏文学和文论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无产阶级文论译介比重的加大。据表3，这一阶段“无产阶级文论”译介为70篇，与所译介的文论总数之比为0.3167，而上一个阶段“无产阶级文论”所占的比率仅为0.1734。之所以如此，当与文艺界人士意识到“革命文学”论争中理论修养不足有很大关系。如鲁迅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说的：“那时候就等待有一个能操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来阻击我的，然而他终于没有出现。”¹⁹⁾因而就“自己来补充这个缺陷”，使“想操这刀子来阻击我的人，也能阻击在致命的地方”²⁰⁾。此外，这也与刊物编辑者意识到普罗文学已经深入人心有关，比如他们关于期刊的编辑方针就有这样的声明：“在编辑的一方面，同人等不愿自己和读者都萎靡着永远做一个苟安偷乐的读书人，所以对于本刊第二卷起的编辑方针也决定换一精神。”²¹⁾总之，苏联无产阶级文论，如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及苏联政坛重要人物的文艺评论、联共文艺政策等，在这个阶段得到了有力的传播。当然，除了文论译介与文学作品的翻译外，大量刊发苏联文坛的消息也是这一阶段期刊编辑的重要特点。这一时期苏联文坛消息115篇，与期刊译介总篇数588篇的比率为0.1956，远远高于前一个阶段的0.0704（38篇与540篇之比）。如《奔流》、《现代文学》、《拓荒者》等不同类型的期刊都辟有专门的栏目发表国内外文坛消息，对在世界上处于重要位置的苏联文坛动向的关注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这类文坛消息大量发布，为国人熟悉了解苏联的文艺动向起着积极的作用，也为论争者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文学背景。

② 1932年5月—1934年7月 1932年4月23日联共中央《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发表后，“拉普”解散。从表4可知，这个阶段的俄苏文论译介73篇，相对于同一时期刊物译介俄苏文学与文论总数232篇的比率为0.3147，而上个阶段这个比率是0.3765（221篇与589篇之比）。这说明，相对于上一个阶段来说，由于“拉普”的解散、期刊与读者趋于理性化，译介俄苏文论，无论是绝对数还是比率，都呈下降之势。不过，这一时期的刊

19) 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中國現代文學教研室主編：《文學運動史料選》

(2) 第19頁，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20) 轉引自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第187頁，陝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1) 陳荒煤：《中國現代文學期刊目錄匯編》（上）第1009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物对苏联无产阶级文论的译介只是相对地减少，即由原来相对文论总数的比率0.3167（70篇与221篇之比）减少至0.315（23篇与73篇之比）。一些重要的无产阶级文论家，如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作品在这个阶段也在继续译介，特别是苏联文坛上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讨论，在这个阶段被及时地介绍到中国。这说明文论的译介还是占很大比重，国人对苏联文艺的接受也在进一步加强。由于接受苏联文艺已经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期刊与读者均能较理性地看待苏联文学，因而从上个时间段开始，评论苏联文学的文章逐步增多。据表1，1917年4月至1928年1月左右，中国读者所发表的关于苏联文艺现象的评论文章篇数与所译介的作品总数之比为0.0926。而据表3，1928年1月至1932年4月左右，这个比率升为0.1005。这表明，相对上个十年来说，读者与期刊更为积极地参与了对俄苏文学的接受过程。此外，这一时期作家作品译介的比率（相对同一时期所译介的作品总数）进一步降低，我们可以看到三个时间段（即1917年初到1928年1月，再到1932年4月，再到1934年9月），作品译介的比率成直线下滑的趋势，即为0.424→0.3759→0.2715，由此可以看出编者和读者的理性批判能力在逐步提高。虽然作家作品翻译的比率总的说来下降了，但是左派倾向的作家作品翻译还是呈现较强劲的势头。比较表1、表3及表4可以看出，左派倾向作品的翻译与同一时期作品翻译总数的比率呈现上升趋势，即为0.0742→0.4887→0.6032。这说明具有无产阶级倾向的作家作品得到了更为有力的传播，也反映出读者对无产阶级文学渴求的程度在提高。虽然有些作品是译者为了满足“衣食”问题而翻译的，但正因为有了读者的喜爱，这些译作才会有市场。这个时期苏俄文艺翻译的另一个特点是，苏联时政要闻远远少于第一个十年，这也许是因为读者已不满足于一般地了解苏联的社会现状，期刊的编辑者要通过作品与文论的译介来提高国民的文学素质与思想觉悟。思想的趋于成熟，是这个阶段的文学论争水准高出前一个阶段的重要原因。

2. 期刊译介俄苏文学与文论对论争的影响：

确立了马列主义文艺思想的主导地位 在1928—1934年间发生的左翼与新月派的论争和“左联”对“自由人”胡秋原、“第三种人”苏汶的论争及“左联”内部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中，期刊译介俄苏文学与文论对在中国文坛上确立马列主义文艺思想的主导地位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首先，译介苏俄文学与文论、介绍苏联文坛及社会现状，扩大了马列主义文艺思想的影响。很多“左联”成员都是在接受了苏联文学及苏联革命的影响后加入“左联”的，他们

投入这些由左翼力量主导的论争时也就自然而然地传达了其所受到的苏联文学的影响。如以《第三种人的出路在哪里》一文参加与“第三种人”论争的金丁就是“受‘普罗’文学影响”²²⁾才到“左联”根据地上海的。我们虽不可说这种影响会以一种直接的、明显的形式反映在论争中，但是肯定会潜在地影响作者的观点及论争的方式，而这种潜在的影响为马列主义文艺思想主导地位的确立提供了重要条件。

其次，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之所以以马列主义文艺思想取得了主导地位而告终，除了马列主义文艺思想自身的真理性外，也是由于俄苏文学在中国大量传播，民众的思想受到了引导，他们认识到马列主义文艺思想是具有真理性的文艺思想。此时不管是“第三种人”的苏汶还是“自由人”的胡秋原，更不用说那些以马列主义文艺思想正统自居的左派理论家如瞿秋白、周扬等，都是以马列主义文艺观作为自己论争武器的。如从胡秋原的《阿狗文艺论》就可以看出非“左联”成员的他对苏联作家、文论家及其作品十分熟悉了解，而且与胡秋原的论争之所以发生，如苏汶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中所说的：“起初当然是导源于俄罗斯。一些名字长得不容易记清楚的人们争论着，在我们还没有梦想到天下有这么一个问题的时候就争论着。”²³⁾不错，在这场论争中，参与者无不引用苏联无产阶级文论及相关背景，不管是论争的哪一方都视自己为马列主义文艺观的正宗，而这些背景知识的获取与当时期刊大量刊发的苏联文论、文学作品及苏联文坛消息是分不开的。如《文艺新闻》还在国内外一些城市设有通讯员，为人们及时提供了大量文艺新闻，从正面积极报道苏联左翼文艺动态。苏俄文学及文论的大量传入和深入人心，自然为马列主义文艺思想的迅速传播和扩大影响创造了条件。

提高了论争的理论水平 鲁迅等人从“革命文学”论争中吸取了经验教训，着手翻译苏联的文论。这些努力在这个阶段取得了重大的成效，反映在论争中，就表现出不同于上一阶段的特点，即主要地不是依靠拙劣的攻击维护自己的观点，而是以无产阶级文论作为论争的武器。如这个时期“中国的普列汉诺夫”瞿秋白针对胡秋原的《阿狗文艺论》及苏汶的《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论辩》等文，不是以讽刺、漫骂的手法加以回击，而是一方面接受他们一些合理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能以客观的分析指出钱杏村观点中积极的方面，即“他总还是一个竭力要想替新兴阶级服务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²⁴⁾在

22)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編：《左聯回憶錄》第182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3) 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中國現當代文學教研室主編：《文學運動史料選》第128頁，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这篇文章中，瞿秋白已经能够辩证地看待如普列汉诺夫等苏联无产阶级文论家的观点。普列汉诺夫是苏联无产阶级早期著名的文论家，“他不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了各种文艺现象的特点，而且阐明了这些现象产生、发展和衰亡的原因。”²⁵⁾但是普列汉诺夫的观点中也存在客观主义和机械论的成分。瞿秋白在客观地评价普列汉诺夫文艺观点的同时，能灵活地将它应用到论争中，并指出胡秋原观点的缺陷所在：“所以胡秋原的理论是一种虚伪的客观主义，他恰好把普列汉诺夫理论中的优点清洗了出去，而把普列汉诺夫的孟塞维克主义发展到最大限度——变成了资产阶级的虚伪的客观主义。”²⁶⁾总之，从这篇文章，我们看到了一个能辩证地分析问题的中国无产阶级文论家的形象。这也是当时中国左翼理论家无产阶级文艺理论修养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

与上一个阶段相比，这个阶段的期刊一般经常发表读者对苏联文坛现象及俄苏作家作品的评论，表明期刊对俄苏文学文论的译介转换到了较主动的位置，对读者的认识能力的增强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诚如关露所言：“‘左联’人除了学习苏联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和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著作而外，还阅读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著作，接受了他们深刻的先进思想影响，丰富了自己的知识和艺术思想。”²⁷⁾因而，相对于前一个时期来说，此阶段的一些论争虽然还可以看到盲从苏联的现象，但是由于论争者理论修养的普遍提高，论争也就从较被动的局面转向主动的局面。这不仅体现在论争双方较少以前那种漫骂或混用不同文论家观点的方法参与论争，而且也体现在论争理论水准的提高，如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讨论的深化。创作方法论问题的探讨，在苏联文坛上曾引起过很大的关注，从“拉普”提出“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再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提出，其中经历了许多曲折。但是在中国，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的讨论，虽然也存在着左倾和僵化的观点，可是茅盾、钱杏村等人发起的对华汉《地泉》三部曲的批判，就已经开始克服早期艺术家的幼稚，可以说是作者理论修养提高的表现。到周扬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一文，中国左翼艺术家的理论水平

24) 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中國現代文學教研室主編：《文學運動史料選》第139頁，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25) 李輝凡：《二十世紀初俄蘇文學思潮》第318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

26) 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中國現代文學教研室主編：《文學運動史料選》第140頁，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27)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編：《左聯回憶錄》第243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已经普遍地被左翼文艺界所接受了。这种转变是建立在当时期刊对这种创作方法的大量介绍基础之上的。从表4我们可以看到，此阶段对无产阶级文论介绍处于活跃的状态，而且这些文论很大一部分就是关于创作方法的讨论。因而可以说，俄苏文学与文论的译介，是中国文艺界理论水平提高的基础。

没能完全克服“左倾”盲从现象 从这一时期刊物的文坛消息及文论译介情况可以发现，“拉普”在中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它的一些文艺方针及文艺观点在“左联”及倾向左翼的期刊上得到传播，连同同人期刊也不例外。甚至在苏联已经清算了“拉普”后，中国文坛仍在传播它的文艺观点。所以这一时期的期刊所传播的苏联文论，与苏联文艺界的真实情形并非完全吻合，有一个时间差。其实当时苏联文坛很有影响力的并非仅有“拉普”一家，以沃隆斯基为代表的《红色处女地》一派也很有势力。中国的期刊一度只知道“拉普”，这样的编辑方针必然会对这一时期的相关论争产生片面的影响。如在“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中，周扬在他的《关于文学大众化》一文中，提到了文艺大众化问题的提出与国际革命作家第二次国际会议的关于殖民地普罗革命文学的决议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会议是由“拉普”主导的，因而也必然反映“拉普”的一些观点。周扬在文章中所强调的“我们要尽量采用国际普罗文学的新的形式，如上面所举的报告文学、群众朗读剧等”²⁸⁾以及文艺作品的“鼓动性”、“活人论”等观点，其实都是“拉普”的核心文艺观点。“活人论”在当时的苏联除了“拉普”对它积极推崇外，其他文学团体和作家几乎对它都持否定的态度。此外，在与“第三种人”、“自由人”的论争中，“左联”也受“拉普”的影响犯了“左倾”的错误。如同“拉普”对“同路人”大肆攻击一样，“左联”对苏汶与胡秋原也展开了猛烈的批判。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为了维护无产阶级立场的坚定性，但另一方面这又缩小了同盟者的战线。可以说，“拉普”所犯的一些错误，常常影响到“左联”。这种“巧合”，不难从期刊片面追随苏联文艺思潮的编辑方针中找到源头。

总而言之，这一阶段期刊的编辑具有更为明显的追随苏联文艺政策的特点，它的负面影响表现为论争过程中的教条主义和机械论。不过，这种追随的姿态也产生了一种较为积极的效果，那就是在苏联清算“拉普”后，“左联”停止了对“第三种人”的批判，从而在在

28) 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中國現當代文學教研室主編：《文學運動史料選》第411頁，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后的论争中能较理性地吸取苏联文艺理论的积极成果。由于苏联解散了“拉普”，“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也停止了活动。张闻天把苏联文坛的这一重大事件与中国的文艺界情况联系起来，发表了《关于文艺上的关门主义》一文，直接导致了对“第三种人”批判的结束。因此，可以说“左联”时期的文艺论争与苏联文坛的形势是息息相关的，而中国的期刊在衔接中苏文艺的关系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具体地说，就是比较长期的潜移默化效果与短期的立竿见影的直接效应。

三、“两个口号”的论争

“两个口号”的论争既与文人相轻的传统有一定的联系，也与左翼文艺运动内部存在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有重大关系。一提及这两种主义，我们自然会想起苏共主导第三国际对当时中国文坛的影响。这种影响的重要途径之一便是期刊，这可以上溯到1917年的《新青年》，下延至1936年的一些刊物。由于1917年—1934年7月间期刊对俄苏文学与文论的译介特点已在上文做过分析，因而这里仅考察1934年8月—1936年上半年这一时间段期刊的编辑特点，然后结合上文对1934年前的期刊编辑特点的分析来考察“两个口号”论争中期刊所起的作用。

1、1934年至1936年的期刊译介俄苏文学与文论的特点 1934年9月，苏联召开了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正式确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主导地位。苏联文艺政策的这一重大调整，对中国当时的期刊译介俄苏文学与文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下文将分别考察国民党系统的期刊、同人期刊、“左联”及倾向左翼的期刊译介俄苏文学与文论的特点。这种区分与前文考察第二个阶段论争时根据期刊倾向进行区分有相似之处，但有一点显著的不同，那就是把原来没有涉及的国民党支持的期刊单独列为一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相对上一个阶段国民党支持的期刊对俄苏文艺只是零散的介绍来说，这一阶段国民党支持的期刊对俄苏文学作品的译介比较多，因此要做一个分析。不管这些期刊的译介动机如何，从客观方面来说，它们为俄苏文艺译介这项大工程提供了片瓦。此外，倾向左翼的期刊，由于它们在译介俄苏文学与文论时所起的作用与“左联”期刊大体相同，为了论述的方便，归在同一类。与上两个阶段不同，这个阶段对苏联文学及文

论的译介状况分析不是以表格的形式进行的，这是因为这一段时间较短，期刊译介数量也有限，可以较容易地把握俄苏文学及文论的译介状况。

国民党支持的期刊 这类期刊有相当一部分译介了苏联文艺，这一方面是因为苏联文艺深得中国人的喜爱，另一方面也正如茅盾所指出的，“这不是对民族解放运动表示支持，而是他们把欧、亚一些国家民族特点的文艺，自以‘民族主义文艺’的同调或者援手的缘故”²⁹⁾。不过这在客观上有助于民众知识水平和审美能力的提高，为建构这一阶段文学论争所需的俄苏文艺背景知识提供了间接的帮助。这些期刊是《文艺月刊》、《中国文学》、《矛盾》等。它们所译介的俄苏文艺，一般以文学作品为主，如《中国文学》所翻译的就只是4篇俄苏小说。《文艺月刊》在1934年1月至1935年4月所译介的12篇作品中有3篇为小说，其他的几篇主要是一些文坛消息。《矛盾》译介的作品共有8篇，小说3篇，其中《三只丝袜》在共出版的5期中连载了4期，“文坛消息”1篇，作家介绍2篇，文论译介2篇。通过对这些译作的分析，不管是哪种类型的作品都与国民党所提倡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主题相关。它们或者是表达民族主义的主题，如《文艺月刊》中的《国赋的母亲》、《仆人》及《伊万杀子》，或者是俄罗斯文学史上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如契诃夫、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人的小说。这些期刊对苏联社会及文坛状况、对苏联文艺政策介绍得很少，特别是苏联无产阶级文论的译介几乎没有，除非苏联国内一些特别重要的且不带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消息才偶有刊发。显而易见，这正是此类期刊的突出特点，它是由其反对“普罗文学”、赞扬“民主主义文学”的立场所决定的。

同人期刊 这类期刊译介俄苏文学与文论时继承了上个阶段的一些特点，即是本着“以忠实恳挚的态度为新文学的建设而努力”来进行“世界文学的研究、介绍与批评”的。³⁰⁾它们刊载了一些俄苏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并非如国民党支持的期刊那样以服务于“民族主义文艺”的目的因而而不可避免的显得单一片面，它们不但译介俄罗斯文学名家的作品，也大量译介“十月”革命前后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如《现代》于1934年3月至1935年4月所翻译的文学作品共有5篇，都是苏联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或反映无产阶级生活的作品。《文学季刊》除了连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和屠格涅夫的《散文随笔》，也有左琴科的小说《恐怖之夜》及高尔基的《天蓝的生活》。同人期刊译介俄苏文学与文

29) 陳荒煤《中國現代文學期刊目錄匯編》(上)第1319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年版

30) 編者：《文學季刊發刊詞》，《文學季刊》1934年創刊號

论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文学作品翻译相对来说比较少，而是以文论译介及苏联社会现状及苏联文艺动态的介绍为主。这一方面有益于提高国人的文艺理论修养，另一方面也为国人全面及时地了解苏联社会及文学状况做出了贡献。以《青年界》这份期刊为例，在1934年5月到1936年7月期间，译介有关苏联的7篇作品中，除了一篇安特列夫的《诗选》，其他六篇都是对苏联文学名家的介绍及对苏联文艺政策的解释。《现代》于1934年3月至1935年4月译介的作品共有10篇，其中所翻译的文学作品共有5篇，另外几篇为文论及文坛消息。《文学季刊》的文学作品介绍4篇，文学论著4篇。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这些特点与上个阶段的译介基本相同。但此阶段的同人期刊在介绍苏联文艺的同时，对在苏联文艺界引起热烈争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介绍得很少。而这也正是这类期刊不同于“左联”期刊及倾向左翼的期刊的一个显著特点。其中的原因，我们不难明白，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期刊，对无产阶级文论缺乏相应的热情和敏锐性是由其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

“左联”及倾向左翼的期刊 《文学》、《当代文学》、《东流》、《译文》、《太白》、《春光》等期刊与前一阶段的译介特点相近，但是也表现出了此阶段左翼期刊追随苏联文艺政策所体现出来的独特性。1934年4月，苏联召开了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成了唯一合法的创作方法，因此左翼期刊译介了大量有关创作方法的文章。如《文学》有周扬译介的作家论《高尔基的浪漫主义》，高纷转译日本西三郎的书评《俄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发达》；《东流》的第2卷第1期有欧阳凡海译的《现实主义与心理主义的表现》及无名译的《托尔斯泰与现实主义》，第2卷第2期有以人译的《法捷耶夫论现实主义》；《译文》第2卷第2期有周扬译的《论自然派》；《夜莺》第1卷第1期有《屠格涅夫底现实主义》，第1卷第3期有法捷耶夫的《新现实与新文学》；《东方文艺》的第1卷第2期有吉尔波的《苏维埃文学地新现实主义》。总之，相对整个苏俄文论的译介来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中国得到了较集中的介绍。此外，这些期刊在译介上也保持了前一阶段左翼期刊的一贯特点，除了《译文》注重对文学作品的介绍外，其他期刊对文学作品如诗歌小说散文的介绍往往处于较从属的位置，而更注重苏联文艺政策及苏联文论的译介。拿《东流》来说，它创刊于1934年8月，多达11期有对苏联文艺作品的介绍，译介的作品31篇，但涉及到作家作品翻译的只有6篇，其它的则分别为文学创作方法论、作家介绍、文坛消息等。再如《文学》，1934年1月至1936年6月有关苏联文艺的译介有46篇，作家作品的介绍只有5篇，其它的则为

“论文”、“补白”、“杂文杂记”或“书评”形式出现的专栏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及对苏联文艺创作方法的介绍，或者是以“文坛展望”或“补白”的形式出现的对苏联文坛消息的介绍；6篇文论中，有5篇是无产阶级文论。《当代文学》有限的4篇译作中，只有一篇小说。《文学新地》仅有的两篇译作是卢那察尔斯基与列宁的文论。《杂文》的11篇译作中，有关文学创作方法的就有6篇。几乎没有对革命民主主义文论家作品的介绍。紧跟苏联文坛译介大量苏联无产阶级文艺理论，是这些期刊的特点。这反映了左翼理论界在接受苏联文学过程中对理论问题的强烈兴趣，也就理所当然地直接影响了“两个口号”的论争。

2.期刊译介俄苏文学与文论对论争的影响

向苏联的文艺看齐 “两个口号”论争中，不管双方的立场是什么，甚至以徐行为代表的机械论者，都唯苏联的马首是瞻。在这些论争文章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对苏联社会、文学及文艺理论的推崇，苏联文艺思想成了他们据以判断口号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对苏联文艺现象与苏联国情的把握，当然离不开近二十年来期刊对苏联社会及文学乃至时政要闻的介绍。从《新青年》开始大力介绍俄苏文学与文论以来，许多期刊都积极跟进。参考表1—表4，我们可以看到，这二十年来期刊对苏联的译介是全方位的，不但大力译介作家作品和文艺理论，而且也注重苏联文坛消息的介绍，为国民及时了解苏联文坛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尤为重要的是，这些期刊通过刊登有关苏联的政治要闻及政界领导的论著，为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苏联社会的窗口。“两个口号”的论争既是文人相轻习性的传统文化因素使然，也为抗日的现实情况所诱使，而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文化的发展也为论争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标准和知识谱系。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论争的话语背景。翻开一部“两个口号”的论争史，以苏联的政治文化思想为论据的论辩随手拈来。如代表机械论一方的徐行在他的《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文学》中这样写道：“如伊利契在《社会主义与战争》和其他各种文献中所说一样”、“在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曾经在文坛出现了取消主义。他的代表人物瓦朗斯基于一九二四年是这样说过”、“故当时苏联勃洛作家大会认为谈到文学领域内似乎可以有各种文学思想派别的和平合作和平竞赛，是一种反动的乌托邦”、“苏联作家协会的章程上有这样的话……”³¹⁾，如此等等地引述苏联的文坛动向、文艺观点及政治方针，不难看出苏联的社会文化背景构成了他参

31) 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中國現代文學教研室主編：《文學運動史料選》第277—281頁，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与论争的重要依据。而“国防文学”的一方也希图从苏联政治文化观念中找到自己的理论依据以证明自己这个口号的正确和正当性，如周扬的《关于国防文学》，就以“他‘刚巧’忘记了这位先哲自己就曾经夸耀过大俄罗斯民族，一点儿也没有轻视过民族的感情”³²⁾来批驳徐行的观点。此外，周扬的文章也不断引用俄罗斯“先哲们”的文艺观作为自己的根据。虽然我们不能说这些知识的获取全都是期刊译介的功劳，因为论争者自己也可以通过所掌握的外语来获取这种知识，或者是通过其它的途径获得，但这毕竟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作为一个知识群体，他们整个的文化眼界的开阔，还是离不开期刊这一广泛的途径，甚至那些通过自己掌握的外语直接获取这些知识者，其本人就是这些期刊译介苏联文学及文论的骨干力量，因而可以说期刊所起的作用虽然是潜移默化的，但却是至关重要的。

加强了论争的理性色彩 首先，体现在论争的双方都能就自己所提出的口号做出一番较理性的解释。如“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双方都说明了这两种文学各自的主题和创作方法问题。胡风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中提到了其所依据的创作方法是“动的现实主义的方法”，其主题是“统一了一切社会纠纷的主题”³³⁾。周扬在《关于国防文学》中同样说道：“国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主题的问题和方法的问题不可分离，国防文学的创作必须采取进步的现实主义的方法。”³⁴⁾可见，双方不但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且都加以理性的、缜密的论证，各包含着一些合理的因素，成为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某种正确性的主张。“革命文学”论争时期不但未能提出较具体的理论观点，更未能解答对方的质问，就是论争过程中也总是违背鲁迅的“恐吓与辱骂绝不是斗争”的原则。由此可以看出相对以前的论争来说，这个阶段的论争更趋于理性化。

其次，理性色彩的强化体现在论争双方对“同路人”都不再采取简单棒杀的态度，而是希望联合文艺界的一切爱国者走向抗日。如“国防文学”的拥护者立波在《关于“国防文学”》中提出：“在国防文学的旗帜下面，一定要除去一切狭窄的宗派思想和意气；凡中

32) 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中國現當代文學教研室主編：《文學運動史料選》第229頁，上海教育出版1979年版

33) 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中國現當代文學教研室主編：《文學運動史料選》第284頁，上海教育出版1979年版

34) 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中國現當代文學教研室主編：《文學運動史料選》第290頁，上海教育出版1979年版

国人，只要不是万恶不赦的卖国卖民族的明中暗里的汉奸，只要不是甘心做亡国奴的猪犬，都是国防文学的营盘里面的战友。国防文学营盘里的人和朋友的通行证，上面只有简单的两句话：我是中国人！我反对汉奸和外敌！”³⁵⁾虽然还有像徐行那种反对联合一切可以抗日的同仁的机械论者存在，但是这毕竟是极少数，而在周扬和郭沫若清算机械论的文章发表后，徐行们也就再没有发表什么意见。从这些论争的文章中，我们不难看出，虽然实际的情况有出入，但双方在主观上先后都表示要反对“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这是一个事实。如周扬在《关于国防文学》中批判徐行就是因为“他的意见正代表着一部分‘左’的宗派主义”，而耳耶在他的《创作活动底路标》中质问周扬的一句话也是：“周扬先生自己底意见究竟超出了‘一切宗派主义’的范围没有呢？”³⁶⁾

其三，论争的结束虽然是国内抗日大环境使然，另一方面也与苏联在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提出的联合统一的文艺政策有间接的关系。因为联合已是大势所趋、深入人心的事了。而这种思想的深入人心与期刊积极主动的译介方针是分不开——那就是紧跟苏联文艺政策，学习先进的文艺理论为己所用。同时，在这一学习过程中又提倡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对“国防文学”口号的辩证看待，就是证明。如立波在《关于“国防文学”》中谈到：“国防文学原为苏联所倡导。可是，它移到中国来，并不是毫无考虑的袭取，它有着客观情势的要求，除了少数明暗的汉奸，谁不要防卫我们的可爱的中国？同时他也有着和苏联的国防文学不同的任务……”³⁷⁾

论争中中性色彩的加强是与苏联文论的译介有关的。苏联文坛在1932年解散了“拉普”等文学派别，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两个口号”论争中，对立的双方都提倡这一创作方法，主张把它应用到创作中来。通过表4及1934年中期之后所译介的苏俄文学资料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期刊对这一创作方法都有译介，关于创作方法的问题已引起广泛的关注。这就十分清楚：左翼内部两拨人的一场论争，直接受到了期刊所译介的苏联文艺政策及创作口号的影响。即使是上文所提到的双方都提倡团结文艺界一切人走向抗日的观点，也受到了苏联解散各种文学派别、提倡统一的“社会主义现实主

35) 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中國現當代文學教研室主編：《文學運動史料選》第266頁，上海教育出版1979年版

36) 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中國現當代文學教研室主編：《文學運動史料選》第327頁，上海教育出版1979年版

37) 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中國現當代文學教研室主編：《文學運動史料選》第265頁，上海教育出版1979年版

义创作方法”及反对“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影响。如萧三（当时“左联”派往苏联的作家代表，关于苏联文坛政策的一些情况大多是他传到国内，并在期刊上发表的）在《我为“左联”在国外做了些什么？》一文中所说的：“何况我当时也想学苏联的样：解散‘拉普’，组织更广泛的统一的作家协会，不更好些吗？”³⁸⁾“左联”解散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学样”的结果，但这同时也是造成论争的直接原因。

论争中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现象 这次论争中所提出的两个口号，都是要求文艺界组织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都要求反映广泛的现实生活，如“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拥护者之一路丁在《现实形势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一文中提到了它的内容范围是：“并不是狭义的把文学的范围缩小，而是动的现实主义的一个发展：一个和目前现实生活的配合，现在生活主流的集中表现。”³⁹⁾“国防文学”的支持者郭沫若在《国防污池炼狱》中谈到“国防文学”的内容是这样的：“我觉得国防文艺应该是多样的统一，而不是一色的涂抹。这儿应该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有纯粹社会主义的一支与狭义爱国主义的，但只要不是卖国的，不是为帝国主义作帐的东西，因而，‘国防文学’最好定义为非卖国的文艺，或反帝的文艺。”⁴⁰⁾可见，两者的思想观点和主张本没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为何又发生激烈的争论呢？因为他们“不是首先从抗日国防的政治上去广泛联合作家，而是要在文学口号上去联合作家。”⁴¹⁾也就是你站在哪一方你就会支持谁的口号，而不是你支持什么口号你就站在谁的一方，口号只是虚设的，这就反映出了这场论争仍然存在“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复杂，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与这一阶段左翼期刊对苏联文艺及文论的译介存在某种片面性相关，这种片面性主要表现为对苏联文艺及文艺政策的亦步亦趋的追随。苏联自从“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文艺界一直存在着“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现象，众多的派别为了维护自己在文坛上的盟主地位，总是排挤他派，不管对方的观点正确与否一味地排斥，唯我独尊。通过中国期刊的

38)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編：《左聯回憶錄》第181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39) 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中國現當代文學教研室主編：《文學運動史料選》第489頁，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40) 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第416頁，陝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41) 陳瘦竹：《左聯文學論文集》第11頁，南京大學學報編輯部，1980年版

译介，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影响到了论争的双方，使其中的一些人为了争苏联文艺思想的正统而粗暴地抨击对方，造成同一战线中的盟友一度反目成仇。因而，这也可以说是苏联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在中国文坛找到了存活的土壤。

结语

中国“左联”十年的文学论争自有其得失，我们不可否认国际大环境与国内时局的影响，同时与文人相轻的传统也有很大的关系。但是，通过对现代文学史前二十年期刊在传播俄苏文学与文论的特点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那就是期刊对俄苏文学与文论的传播不但在广度上而且从深度上影响到了这些论争。本文的目，是对此予以清理，并借历史的经验以提醒当下的理论界要通过一斑以观全豹，重视俄苏文学及文论对中国现代乃至当代文学所产生的重要影响，重视期刊的传播对中国现代文学乃至当前文学发展的重大影响。

(表1) 1917年初-1928年1月的统计

分类 刊名	俄苏作品 (诗歌小说散文戏剧)					俄苏文论 (理论、批评、史论)				苏联文坛动态	苏联政论及时政要闻	合计
	名家名作 (包括左派名家名作)	左派名家名作	左派倾向作品 (包括左派名家名作)	其它	合计	苏联无产阶级文论	其它		合计			
							中国读者评论 (数据已计入右栏)	各国评论 (不含苏联无产阶级文论)				
·《新青年》 17.4—24.8	11		1	4	16	1	2	6	7	3	96	122
《每周评论》											13	13
《新潮》	4	2	2	1	5						3	8
《国民》	1				1						3	4
《少年中国》	1			0	1	0		2	2			3
《解放与改造》	1			1	2	0	5	10	10	0	30	42
《新社会》	3	1	1	1	4						2	6
《曙光》	6	1	1	2	8			1	1		18	27
·《小说月报》 21.1—27.12	65	6	7	24	90	8	30	45	53	31	0	174
·《文学周报》 21.5—27.12	8	1	1	7	15	1	10	12	13			28
《戏剧》				1	1					4		5
《努力周报》	1				1							1
《小说世界》	39			1	40							40
《文艺周刊》	7			0	7							7
·《语丝》 25.2—27.12	5			1	6		1	2	2			8
《莽原》(周刊)	8	2	2	4	12		1	1	1			13
《莽原》(半月刊)	8	1	2	5	14	5	1	1	6			20
·《创造月刊》						1			1			1

26.4—28.1												
《沉钟》	1			1	2							2
《现代评论》	1				1						10	11
·《北新》	3				3	1		1	2			5
26.10—27.12												
合计	173	14	17	53	229	17	50	81	98	38	175	540

说明：

- ① 以下2个表格的统计数据均来自陈荒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 ② 表示对该刊只统计了这一阶段译介俄苏文学文论的数据，其它时间段的译介数据没有统计在内，下同。
- ③ “左派名家名作”指既属于“左派倾向作品”又属于“名家名作”，其数据同时计入“名家名作”和“左派倾向作品”，因而“名家名作”=“左派名家名作”+“左派倾向作品”+“其它”=“俄罗斯文学作品”的合计，下同。
- ④ 作品中的“其他”是指一般作品，即既不属于“左派倾向作家作品”，又不属于“名家名作”，下同。
- ⑤ “苏联无产阶级文论”包括苏联无产阶级文论、文艺政策、文学理论及对作家作品的评论，下同。
- ⑥ “中国读者的评论”不分作者的阶级倾向，其数据已计入“各国评论”栏，单独列出是为了说明中国评论家的思想成熟度，下同。
- ⑦ “各国评论”，指苏联无产阶级文论以外、包括苏联非无产阶级文论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有关苏联的文学评论，下同。
- ⑧ 此表时间段为1928.1—1934.7，个别期刊稍有出入。

(表2) 按期刊倾向分类的1928年1月—1934年7月的统计

分类	俄苏文学(诗歌小说戏剧散文)					俄苏文论(理论、批评、史论)				苏联文坛	苏联政论要闻	合计
	名家名作(包)	左派名	左派倾向作品	其它	合计	苏联无产阶级	其它		合计			
							中国读者	各国评论				

刊名	括左派名家名作)	名家名作	(包括左栏数据)			文论	评论(计入右栏)	(不含苏联无产阶级文论)		动态		
《未名》			1		1	2		1	3			4
《奔流》	9	4	4	4	13	6		6	12			25
《大众文艺》	6	6	11	2	13		1	1	1	1		15
《朝花》	1	1	3	2	5	1	1	1	2			7
《新流》	1	1	3		3							3
《引擎》	1				1			1	1			2
·《文学》 33.7—34.5	4	4	5	1	6	2	2	3	5	24		35
《涛声》				1	1			4	4			5
《文艺新闻》						2		6	8	19	1	28
《新文艺》	3	3	6	2	8	8	1	2	10			18
《春潮》	2	1	2		3	1	4	7	8			11
·《创造》 28.1— 29.10						4			4			4
《太阳》	1	1	2		2		1	1	1			3
小计	28	21	37	12	56	26	10	33	59	44	1	160
《萌芽》	4	4	9		9	5	1	2	7	5	5	26
《拓荒者》			17		17	11	3	3	14	1		32
《北斗》	1	1	2		2	1			1			3
《文学月报》	1	1	9	0	9	3	3	4	7	6		22
《文化月报》						3	4	6	9	2	2	13
《文学杂志》			2		2	2			2			4
《文艺月》	2	2	2		2	2		1	3	7		12

	报》													
	《春光》	5	2	2	1	6	4		1	5			11	
	小计	13	10	43	1	47	31	11	17	48	21	7	123	
同人 期刊	·《小说月报》 28.1— 31.12	9	2	10	9	26	7	6	17	24	39	1	90	
	·《文学周报》 28.1— 29.12	7	1	8	6	20		12	14	14	5		39	
	·《语丝》 28.2—30.2	6				6	1	1	10	11	1		18	
	·《北新》 28.2— 30.11	9	2	4	3	14	2	4	16	18	5	15	52	
	《幻州》			1	2	3							2	5
	《真善美》	13	2	2		13	1	2	2	3	1	2	19	
	《新月》	1				1		2	3	3	3		7	
	《现代小说》	9	3	4	3	13	2	2	4	6	4		23	
	《开明》	2				2	1	1	3	4			6	
	《乐群》	1	1	1		2	3		2	5			7	
	《红黑》	2				2							2	
	《人间》				1	1							1	
	《华严》	1				1							1	
	《现代文学》	3	1	4		6	1	3	8	9	14		29	
	《读书月刊》	2	1	1	3	5		2	4	4	5	1	15	
	《青年界》	6	1	1	1	7		3	7	7	6	1	21	
《新时代》	5	3	3	1	6			3	3	10		19		

	《现代》	5	2	7	2	12	2	3	11	13	4		29
	小计	72	19	46	31	140	20	41	104	124	97	22	383
	三类期刊总计	113	50	126	44	243	77	62	154	231	162	30	666

此表按期刊性质划分，时间段为1928.1—1934.7，个别期刊稍有出入。

(表3) 按时间段分类的1928年1月—1932年4月的统计

分类 刊名	俄苏文学 (诗歌小说戏剧散文)					俄苏文论 (理论、批评、史论)				苏联文坛动态	苏联政论要闻	合计
	名家名作 (包括左派名家名作)	左派名家名作	左派作品 (包括左派名家名作)	其它	合计	苏联无产阶级文论	其它		合计			
							中国读者评论 (计入右栏)	各国评论 (不含苏联无产阶级文论)				
·《小说月报》 28.1—31.12	9	2	10	9	26	7	6	17	24	39	1	90
·《文学周报》 28.1—29.12	7	1	8	6	20		12	14	14	5		39
·《语丝》 28.2—30.2	6				6	1	1	10	11	1		18
·《创造》 28.8—29.10						4			4			4
·《北新》 28.2—30.11	9	2	4	3	14	2	4	16	18	5	15	52
《泰东》	1			1	2						2	3
《真善美》	13	2	2		13	1	2	2	3	1	2	19
《太阳》	1	1	2		2		1	1	1			3
《未名》			1		1	2		1	3			4
《文化批判》							1	1	1			1
《现代小说》	9	3	4	3	13	2	2	4	6	4		23
《新月》	1				1		2	3	3	3		7
《我们》	2	2	2		2							2

《畸形》	1	1	1		1							1
《奔流》	9	4	4	4	13	6		6	12			25
《开明》	2				2	1	1	3	4			6
《思想》			1		1						4	5
《大众文艺》	6	6	11	2	13		1	1	1	1		15
《乐群》	1	1	1		1	3		2	5			6
《春潮》	2	1	2		3	1	4	7	8			11
《熔炉》						1			1			1
《朝花》	1	1	3	2	5	1	1	1	2			7
《海风周报》			3	1	4	2	3	7	9	1		14
《红黑》	2				2							2
《人间》				1	1							1
《华严》	1				1							1
《新流》	1	1	3		3							3
《引擎》	1				1			1	1			2
《戏剧》				1	1	1		3	4			5
《南国月刊》						1	1	6	7			8
《南国周刊》						1	3	3	4			4
《新文艺》	3	3	6	2	8	8	1	2	10			18
《萌芽》	4	4	9		9	5	1	2	7	5	5	26
《拓荒者》			17		17	11	3	3	14	1		32
《艺术》							2	2	2			2
《文艺讲座》						4	1	5	9			9
《骆驼草》			1		1							1
《沙仑》						1			1			1
《开展》	1				1							1
《现代文学》	3	1	4		6	1	3	8	9	14		29
·《文艺月刊》 30.9—32.4	2		1	2	5			2	2			7
《读书月刊》	2	1	1	3	5		2	4	4	5	1	15
《当代文艺》			5		5			1	1			6
《文艺新闻》						2		6	8	19	1	28
·《青年界》 31.3—31.7	4			1	5			2	2	2		9
《现代文学评论》	1				1			1	1	4		6
《前哨》							1	1	1	1		2
《创作》	1				1							1
·《新时代》 31.8—32.6	2			1	3			3	3	4		10
《北斗》	1	1	2		2	1			1			3

合计	100	38	108	41	221	70	59	151	221	115	31	588
----	-----	----	-----	----	-----	----	----	-----	-----	-----	----	-----

此表时间段为1928.1—1932.4，个别期刊考虑到连载译作的完整性稍有出入。

(表4) 按时间段分类的1932年5月—1934年7月的统计

分类 刊名	俄苏文学 (诗歌小说戏剧散文)					俄苏文论 (理论、批评、史论)				苏联文坛动态	苏联政论及要闻	合计
	名家名作 (包括左派名家名作)	左派名家名作	左派倾向作品 (包括左派名家名作)	其它	合计	苏联无产阶级文论	其它		合计			
							中国读者评论 (计入右栏)	各国评论 (不含苏联无产阶级文论)				
·《文艺月刊》 33.1—34.6	3	2	2	1	4			3	3	20		27
·《青年界》 32.10—34.6	2	1	1		2		3	5	5	4	1	12
·《新时代》 32.7—33.8	3	3	3		3					6		9
《涛声》				1	1			4	4			5
《矛盾》	3		2		5	1	2	5	6	2		13
《现代》	5	2	7	2	12	2	3	11	13	4		29
《文学月报》	1	1	9	0	9	3	3	4	7	6		22
《文艺茶话》	1				1							1
《小说月刊》				1	1		3	3	3	1		5
《文化月报》						3	4	6	9	2	2	13
《无名文艺》				1	1							1
《艺术新闻》				1	1					4		5
《文学杂志》			2		2	2			2			4
《文艺月报》	2	2	2		2	2		1	3	7		12
《文艺情报》			1		1			1	1	9		11
·《文学》 33.7—34.5	4	4	5	1	6	2	2	3	5	24		35
《文艺春秋》								2	2			2
《文艺》	1	1	2		2	4	1	1	5			7

《文化列车》										4		4
《中国文学》	2			2	4							4
《春光》	5	2	2	1	6	4		1	5			11
合计	32	18	38	11	63	23	21	50	73	93	3	232

此表时间段为1932.5-1934.7, 个别期刊稍有出入。

参考书目

- 李何林,《中国文艺论战》,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
- 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
- 《文学运动史料选》(1, 2, 3),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79年版。
- 陈荒煤,《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上),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 《左联回忆录》,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年版。
- 李辉凡,《二十世纪初俄苏文艺思潮》,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1993年版。
- 陈建华,《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 学林出版社, 1998年版。
- 陈瘦竹,《左联时期文学论文集》, 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 1980年版。
- 张捷,《十月革命前后苏联文学流派》,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年版。
- 白嗣宏,《无产阶级文化派资料选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年版。
- 艾晓明,《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1年版。
- 刘炎生,《中国现代文学论争史》,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
- 汪介之,《回望与沉思: 俄苏文论在20世纪中国文坛》,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 吴元迈,《苏联文学思潮》,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5年版。
- 陈寿明,《高尔基美学思想研究》, 新华出版社, 2002年版。
- 程正明,《列宁文艺思想与当代》,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
- 廖超惠,《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争史》, 武汉出版社, 1997年版。
- 吴立昌,《文学的消解与反消解: 中国现代文学派别论争史论》,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Abstract

The Ten-year Dispute Among “Leftwing Federation” And Periodical In the Process of Transmission of Russia-Soviet literature and Criticism

Chen Guoen Sun Xia

Both the problems induced by ten-year literary dispute among leftwing feder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Russian-Soviet literature & criticism were involved in translation of periodicals. From early 1917 to early 1928, Chinese periodicals put stress on translation of well-known Russia-Soviet writers and masterpieces, and information of Soviet current events and headline news, which constituted a cultural background for the disputes over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advanced both sides’ attention to critical issues. However, owing to less translation of proletarian literature and Marxist criticism, the disputers hadn’t enough ideas of literary theories and were liable to utilitarian selection of what they needed for disputes. From 1928 to 1934, besides leftwing periodical, some periodicals sympathetic for Left-wing Federation took an active part in translating Russia-Soviet literature and proletarian criticism which helped greatly in expanding the influence of Russian-Soviet literature & criticism and exalted the level of theoretic disputes. In spite of that, owing to their complete inclination to or fanatical faith in Russian-Soviet ideology and criticism, some members of Leftwing Federation appeared to be tangled with theoretical partiality and prejudice. From 1934 to 1936, the periodical sponsored by Kuomintang chose to translate some Russian-Soviet literary works in order to support their “Nationalistic Literary Movement” theoretically and pragmatically. Meanwhile, both leftwing periodicals and sympathetic ones translated lots of Russian-Soviet literary works and theories, especially the socialist realistic creation methods and Soviet policies for literature &

arts. Enforced with translated theories, the disputes over two slogans became more theoretic and penetrating. Nevertheless, the disputers failed to overcome their sectarianism and exclusivism.

Key Words : Ten-years Disputes among “Leftwing federation” Literary Dispute
Transmission of Russia-Soviet literature & Criticism Periodical